

文化与诗学丛书

童庆炳 马新国 主编

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

李春青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化与诗学丛书

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

李春青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李春青著.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文化与诗学丛书)

ISBN 7-303-05776-5

I. 宋… II. 李… III. 古典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宋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976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88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文化与诗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马新国

编 委 童庆炳 程正民 马新国

李壮鹰 罗 钢 王一川

李春青 张海明

总 序

童庆炳 马新国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 80 年代初期，文学理论界普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法规性”口号产生了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人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就艺术谈艺术，完全脱离社会与



总

序

1



现实，从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做法，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新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2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

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版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勿容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物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乃是根植于



总

序

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





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现的广阔的空间。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文化诗学丛书”是北师大文艺学学术群落向文艺学前沿运动的又一次努力。这 10 本书内容不尽相同，有古有今有中有外，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看起来“面貌”并不相似。但我们的方法却都是“文化诗学”的。追溯文化背景，揭示文化意味，谈古必然要论今，谈西必然要论中，跨越中西古今文化距离，这是本丛书的一个基本



学术追求。

限于我们的学术功力，丛书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漏，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2000年5月23日

引言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反思

时值世纪之交，作为文艺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该以怎样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换言之，在异彩纷呈的 21 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将以什么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依凭？它如何在充满现代性的学术话语领域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恐怕是每一位研究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

20 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虽然从未像美学、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学科那样成为一时之“显学”，却始终以为极为稳健的步伐前进着。有质量的论文、专著层出不穷。特别是有几部大部头的文学批评史著作相继面世，使古代文论研究看上去成果颇为辉煌。这些著作无论是材料爬梳之细密还是持论见解之深刻均远非当年老一代的创业者可以比肩，更不用说方法上的科学与合理了。

然而面对古代文论研究的丰硕成果，那种合乎逻辑的总结成绩与歌功颂德之举却好象并未出现；研究者们也丝毫没有踌躇满志的感觉，相反，从近年来一些研究论文和会议发言上人们似乎不难感觉到一种惶惑与危机之感。大家实际上都在怀着同样的问题：古文论的研究与当前的文艺学建设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究竟有着怎样的关



引

言

1



系？面对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的西方学术话语的“地毯式轰炸”，我们那无比丰富、无比精妙、千锤百炼、意旨高远的古代文论话语究竟以何种姿态作出回应呢？

问题无疑是极为严峻的：一种学术研究如果对于属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同类学术话语的挑战不能作出回应，只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么这种学术研究无疑是可悲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如果不能将自身融入现代学术的潮流之中，不能成为现代学术文化建构工程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前途无疑是黯淡的。

说到底，人们之所以感到古代文论研究面临着危机，实际上只是由于存有一个疑问：这种研究究竟有何用？它如何获得现代意义？这个疑问之所以存在或许是基于文论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差异。从来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有何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它本身就是审美对象，是精神消费品，一种文学作品只要还有阅读者，它就拥有存在的合法性。而文学研究本身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法性学术活动，不需要有什么额外的动机。例如我们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或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或者曹雪芹的小说，只要得出合乎各自逻辑的结论就可以了，人们绝不会追问说这种研究究竟为了什么，在这里研究本身就是目的。古代文论研究就不同了。文论不是审美对象，这意味着它本身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产品——它是依附于文学作品的，或者总结文学创作规律，或者阐释文学作品特征，等等。这样，古代文论本身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种研究究竟有何用？如果说古代文论的研究是为了了解古代文学，那何必不直接去研究古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呢？如果说这种研究是为了借助古人的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为今天的文艺学建设提供经验，那么古代文论的话语系统如何才能进入现代文艺学体系之中呢？

于是人们处于两难之境了：如果我们希望对古代文论进行纯客观的研究，即为研究而研究，就很难使之进入现

代学术话语的建构之中，这种研究也就成了纯粹的无用之学了；如果我们要对古代文论用现代学术话语进行改写，从而使之成为现代文艺学建设的一部分，那就再也见不到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了。在“有用”与“求真”之间不可兼得。

目前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正是以“有用”与“求真”为标志分为两派。“有用”的一派有感于中国当前文艺学研究处于“失语”状态，希望通过古代文论的研究整理寻觅出一套纯粹中国式的文艺学话语系统，并以此作为与形形色色西方文论话语平等对话的依凭。这想法是何等好哇！可惜不知如何运作才好。不借助于现代通行的文论话语来整理或诠释古代文论中那套独特话语，就无法使之成为具有普适性的学术范畴与原则；而经过现代通行的学术话语再度阐释过的古代文论也就不再能够作为纯粹中国式的文艺学话语系统而充当治疗“失语症”之良方了——可见“有用”的一派是无法摆脱古代文论研究之两难境地的。在这种观点背后我们不难感觉到一种赛义德式的民族情绪的涌动，精神无疑是感人的，无奈的是学理是无情的。

“求真”的一派执着于古代文论本身含义与意义阐释，主要是进行古代文论范畴、观念发生、演变轨迹的梳理工作。此派研究毫无疑问是有学术意义的：它是一个学科的基础性研究，观念随时而变，资料却是历久而弥新的。因此做资料的学问历来被称为传世的学问。然而资料的整理是建立在学科本身具有存在价值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学科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这个学科的研究资料也就一文不值了。退一步说，即使学科有存在价值，资料工作也只能是最基础性的研究，是研究的入门。任何学科建设都不能仅仅停留在整理资料的水平上。它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评价，从而提供意义与价值。“求真”派的研究者往往以资料整理工夫见长，一涉及分析评价就难免陈词滥调、人云亦云。





“有用”派的观点之所以只能说说而无法实施乃是因为言说者压根儿就没有真正深入思考过建立中国式的文艺学体系的可行性问题。他们只是提出口号，根本没有行动纲领，更谈不上具体行动了。俗话说：说着容易，做着难，正此之谓也。“求真”派之所以长于爬梳整理而短于分析评价乃是由于此派学人大都鄙视西学，对当代社会人文学科的诸种研究方法、思路、视角充耳不闻，其思考模式还是几十年前即已形成的陈旧观念与方法论。所以他们不分析评价则已，一分析评价就必然是一股陈腐气扑面而来。

二

既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着上述不足与局限，那么应该如何才好呢？正如前面所说：说着容易，做着难。对别人的研究冷眼旁观、挑剔指摘是再容易不过了，但要拿出自家的见解就不那么容易了。别人是如此，笔者同样如此。虽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毕竟还是要说出来，供大家参详，否则就真的难逃光说不练之讥了。

首先我们要绕过一个误区：似乎只有运用中国固有的文论话语建构起来的文艺学体系才是中国式的，否则就是“失语症”。我们暂不论对现在通行的文论话语来一番肃清甄别，看看哪是外来的，哪是本土的，是否具有可行性；也不论用纯粹中国式的文论话语是否同时也要考虑恢复文言文，我们只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就够了：即使全篇都是中国式的话语，是文言文，其所言说也不必然就是中国式的文论体系。例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通篇文言，而其意指却全是西方文论观念。由此可见，一种文论体系是否是中国式的并不在于其所运用之话语形式，“失语症”其实不是真病。

其次我们还要绕过一个误区：似乎只有中国式的文论体系才是有价值的。为什么说到冰箱、洗衣机我们不强调“中国式的”，即使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也必然有“采用了



日本、美国先进技术”之类的广告词，而一说到社会人文学科，涉及价值观念时，我们就必然要标榜“中国式的”呢？这骨子里暗含的难道不是“中体西用”这一洋务派的陈腐观念吗？洋务派标榜“中体西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彼时中国是被排斥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没落帝国，只有坚持中国之“体”方能保持君主专制体制的合法性，所以诸事均可学西方，唯独体制与价值观念动不得。现在我们已然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于世界潮流之中，世界影响着世界，我们也影响着世界。我们面对西方学术话语的进入何以要惊惶失措呢？处于同样一个世界潮流中的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渗透、交流难道不是正常现象吗？中国先贤不是早就说过“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至理名言吗？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精密些、系统些、有效些，我们拿来用就是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失语症”论者是害怕或者不甘令中国传统中那些极为优秀的东西被丢掉。这其实也是多虑。真正的好东西是丢不掉的。事实上，我们的文论话语中依然包含着大量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容——从价值观到方法论都是如此。即使是借鉴西方某家理论或批评观点，经过我们的阐释之后也往往暗暗渗透了中国传统的东西，例如朱光潜先生描述过的“移情论”与费肖尔、立普斯的“移情论”已有相当的差异了，而我们从朱先生那里间接地了解到的“移情论”就包含了更多的“中国特色”。这是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一种“合理误读”。我们固有的文化质素就在这种“合理误读”中获得新的生命。

绕过了上述两个误区之后，我们可以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出路问题了。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做些努力：

其一、创新意识。我们的文论研究从来就是接受意识有余而创新意识不足——不善于用新的、独到的眼光去观



察、判断、评价。或者说西方的批评方法如何如何，或者说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如何，就是讳言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如何如何，似乎我们都是生就的弱智、白痴，只能摹仿祖宗和外国人，不可能有自己的创造。或许有人会说，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创新可言呢？我们当然无法对研究对象本身有所创新，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研究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古代文论，黄侃有黄侃的方法，郭绍虞有郭绍虞的方法，罗根泽有罗根泽的方法，朱东润有朱东润的方法，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方法。没有方法论的革新，即使在材料上较前人梳理、搜集的更细密完整那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这主要是指方法的更新而言的。就目前的古文论研究来说，研究者大量吸收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尝试过的种种研究方法，融会贯通，根据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创造出一种或若干种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那真可谓功莫大焉了。

其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方法论上采取综合研究的视角，将古代文论与古代哲学、宗教、伦理、艺术以至政治制度、民风民俗、自然环境、民族交往等等文化历史因素视为一个彼此相连的整体，视为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文化符号系统。因此在分析文论范畴与观念时往往必须在其他类型的学术话语中寻找根源与演变轨迹。于是就引出这种文化研究的第二层含义：在研究对象上扩大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古人关于诗、文、词、赋等文学类型的评论方面，对于其他非文学文类中的诗性特征（或称诗意性、诗意境界）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来看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话语本身常常即是合哲学、伦理、宗教、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类型（例如儒、释、道三家学术均是如此），学科分类意识并不像西方人那样鲜明。我们倘若囿于现代学科分类的标准来衡量古代文论，就难免有圆凿方枘之虞了。可以这样说，无论老庄孔孟、易庸佛禅，其中俱有诗在，至于诗品诗话倒是等而下之的。

其三、摒弃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只关注研究本身的圆融自洽。古代文论的研究不应该过于顾虑有用无用的问题，更不应该试图将古代文论的范畴与观念作为今日文艺学建设的主要理论资源。我们只要将古文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探讨，作为一种话语系统或知识系统来考察，看看它是如何发生、如何演变的，这种发生与演变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与政治观念的转变，这种知识系统与古代文化学术系统的整体性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它究竟表证着古人怎样的生存旨趣，这就足够了。至于古代文论对于今日的文艺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实践具有什么意义与价值，这是一个文化流变中的自然选择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无论我们怎样设想与呼吁都是毫无用处的，该逝去的总会逝去，该留下的总会留下。研究对象或许是陈旧的，研究本身却可以常新。

三

人们常常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但一旦对之展开研究时就将这种独特性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譬如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没有很强的学科分类意识，或者说中国古代学者的学科分类意识与现代通行的分类标准相去甚远。这本是人人知晓的常识，但在具体研究中却往往被忽略。这一点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人们经常抛开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性而单独探索文论范畴与观念的产生与演变，好象中国古代真的存在着那么具有独立性的文论系统似的。事实上，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与观念都是在与其它学术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发生发展的，因此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性把握，要比较准确地理解古代文论的范畴、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

例如有一个现象大约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独有的：许多诗学境界，或云旨趣、价值追求、审美趣味、风格特征，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来说，其实并不是从诗歌作品中总结出

